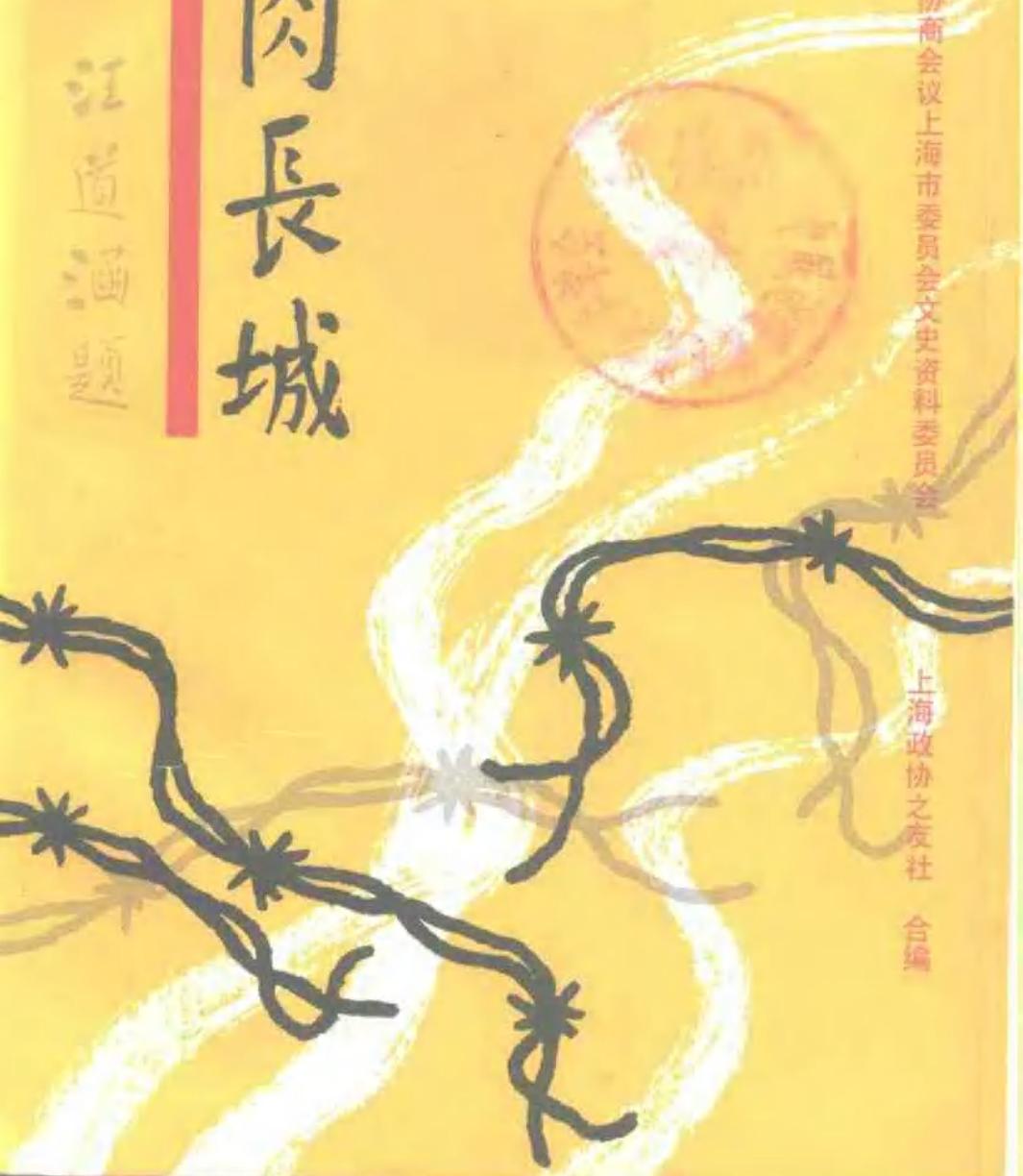


0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上海政协之友社 合编

血肉長城

江道酒題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七辑

血肉长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上 海 政 协 之 友 社 编

责任编辑 施福康 李小棠

封面设计 范一辛

血肉长城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十七辑)

出 版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上海市北京西路 860 号)

印 刷 上海新华印刷厂 (上海市大连路 130 号)

发 行 在沪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出版日期 1995 年 7 月

国内统一刊号 CN 31-1229

定价 10.00 元

《血肉长城》专辑编委会

主 编：王 兴

编 委：范征夫 陈念云 郑拾风

江 华 徐开垒

执行编辑：唐新治 林黛文 李 忠

编 辑 说 明

一、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五十周年，我们编这本专辑，既为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也是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一本生动、史料翔实、有价值的资料。

二、本书作者多年事已高，因时间久远，撰写回忆文章难免有疏漏之处，再者我们编辑水平有限，如有谬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95年4月

前　　言

谢　希　德

五十年过去了，但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那段日子的经历还有如昨日，许多动人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在这个专辑中记载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回忆，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战争的不同侧面；从后方到前线，从西北到东南，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座军民共建的血肉长城。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而今已是白发苍苍的长者。转战南北的双腿，如今已有些步伐蹒跚，然而记忆却仍是那么清新，生动的文字把读者带回到战火连天的年代，引起心灵的共鸣，凡是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都有着对日本军阀的无比仇恨，也更加懂得如何珍惜美好的今天。

不是为了回忆而回忆，因为忘记过去就等于是背叛。前事不忘犹疾首，居安思危更奋发。这个专辑可使人们特别是年青的一代了解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和中华儿女浴血抗战的光辉业绩，是一本很好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可以增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继承和发扬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光荣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加民族的凝聚力。

从这本专辑中我们看到在那艰苦的岁月中，所以能战胜敌人，主要依靠了党的领导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团结紧密的军民鱼水关系，就不可能以弱胜强，以寡胜众，取得最后的胜利。

从这本专辑中我们还学习到革命者的勤俭节约、无私忘我的

奉献精神，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激励我们不断前进。

当前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进一步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发展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祖国，特别是上海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但是由于我们人口众多，地区之间发展也还不平衡，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不少困难，也会遇到许多新事物，需要去解决许多新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特别需要学习和发扬老一辈革命者的优良品质，因此这个专辑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读者们可从中取得营养，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目 录

(依姓氏笔划为序)

前 言	谢希德(I)
愿把青春换明天	马 达(1)
一个美国记者看抗日战争	马飞海(7)
日伪警察局内的反日斗争	马仁友(12)
战争中学做记者	王 维(16)
历史的见证	王西彦(21)
中国早非华夏	王辛笛(24)
国难当头 投笔从戎	叶尚志(26)
从上海到延安	卢伯明(38)
伟大的“八一三”	冯英子(42)
我所知道的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电台活动片段	刘人寿(45)
难忘的平型关战役	刘邦云(50)
战斗在地下运输线上	刘燕如(52)
百团大战在井陉	齐维礼(61)
难忘的盐城战斗	江 华(63)
千群鱼水情	关 建(70)
受降日子里的一个日本友人	阮武昌(73)
岁月流逝 余辉长在	寿进文(78)
忆日本投降前后的上海地下军	杨 邶(81)

渡过黎明前的黑暗	杨士法(88)
斗争在抗日救国战线上的广大华行	杨延修(94)
在女学生中传播革命火种	杨佩金(107)
我所了解的“武抗”组织的抗日游击队	李云(110)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诗三首)	李楚材(118)
浙东的无形战线	严政(119)
被遗忘的丛林	劳远盛(124)
我在抗日烽火中入党	吴增亮(131)
记一个地下党支部办工厂	余仲舒(135)
我在抗战时期党醒	闵淑芬(142)
到延安去	汪解民(145)
驿站四月	沈诒(152)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宋瑞珂(160)
站在烈士墓前	张伟强(164)
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张承宗(170)
胜利后回上海之忆	陆诒(176)
一场反对日汪的群众运动	陈一鸣(183)
在最后胜利的日子里	范征夫(199)
抗战拾零	罗竹风(206)
杭州历险记	周谷城(211)
不忘侵华日首的一首“祭忠诗”	郑重为(217)
抗日战争回忆片断	宗之琥(219)
《义勇军进行曲》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孟波(229)
抗战胜利曲的余音	
——忆东台的惩奸除霸	胡辛人(240)
在启东抗日锄奸的日子里	赵志良(246)

南洋华侨拳拳爱国心	赵维梁(250)
沪东地下军	夏明芳(252)
往事难忘五十年	徐开垒(254)
血战昆仑关纪实	黄启汉(263)
记“孤岛”时期的《简报》	屠基远(268)
与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共同战斗	靳怀刚(277)

愿把青春换明天

马 达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了，这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正像列宁曾经说过的那样，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一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它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它的了解也就愈深刻。今天我们回忆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和经验，是为了更深刻地了解历史和学习历史。

在抗战的烽火中，我从少年走向青年，从一个中学生成为一名抗日战士。七七事变，日寇侵华，华北战火遍地，为了打通华中交通运输线，日本侵略军对安徽的广德、安庆飞机场狂轰滥炸，平民死伤数百。我家在安庆城郊（属怀宁县），为了逃难，我这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初中一年级生，背井离乡，告别父母，随逃亡的难民大潮辗转流浪来到上海。我们这些流亡学生，生活异常艰难，但抗日热情很高。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影响和教育下，我们到工厂参加歌咏队，高唱抗战歌曲，秘密传阅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在学校组织声讨汪逆投降卖国罪行的集会。我们每天舍不得吃早餐，省下一点钱来买报纸，天天注视着抗日前线的战况。

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在事变后的第三天，我们几个知己的同学彻夜商量，决定立即参加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一九四一年初，在地下党交通的引导下，我们分批越过敌伪重重封锁线，来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到达苏中区党委驻地东台城的

第一天，就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第二天拿着分配给我的一支马枪和两颗手榴弹，随教导队的同志分散到农村去打游击，开始了我作为一名抗日战士的征程。那时，我差一个多月16岁。

一个年青的学生，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救国的本领，人长得比马枪只高一头，瘦得像根芦柴棒，但凭着一颗爱国抗日的火热、赤诚的心，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在敌后，在频繁的反“扫荡”、反“清剿”斗争中，紧张的战斗、生活。那时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刚大片开辟，领导上派我去农村组织农抗会（农民抗敌协会），开展反霸锄奸、二五减租斗争；到边缘区组织武工队，担任指导员做政治工作，带领民兵挖公路、打伏击，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把贫下中农当作自己的父老兄弟，和他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想在一起。在斗争的实践中，我逐步了解了农民，了解了农村，了解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使我整个身心得到从未有过的升华。就在这16岁的花季，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它锻炼、培养了无数青年，我1942年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有切身的体会。苏中抗日根据地不断开辟，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办报纸作为教育和组织群众抗战的需要，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组织上调我去参加筹办苏中区党委和二地委联合机关报——滨海报，我文化水平低，又不懂办报业务，但党的任务，抗战的事业，就是我的愿望，我打起背包就报到了。报社从外表看，只有一根长长的天线竿和一部独轮车，我们包括编辑、记者、报务员、译电员、誊写员、发行员和炊事员在内一共九个人，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集体。每个人带着步枪、手榴弹和粮袋，天天行军，有时一昼夜要行七次军，一驻下来就开始编报。由名叫大个子的炊事员推着的独轮车，放着蓄电池、天线杆、玉米、麦糁和

烧饭的铁锅。进村后第一件事，就是架起天线，让报务员打开接收机，收听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我担任记者，由于战斗频仍，交通网还未建立，无法外出采访，只在附近部队、机关和农村写一点新闻报道。1942年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最紧张、艰苦的年月，抗击德国、日本法西斯的斗争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一收听到新四军、八路军在各个战场上迎击敌人的战报，和苏联红军在哈尔科夫等地胜利的捷报，连夜绘制地图，编写新闻和通俗讲话材料，连夜把报纸编印出来。根据地没有印刷厂，也没有安定的环境印刷，我们出版油印报，从一所中学借来两块钢版，用吃饭的筷子，用磨圆的缝衣针，做成一支支铁笔，又通过敌工部从敌占区买来蜡纸和油墨，用密达尺作为印刷的滚筒，在木桌上进行印刷。编辑、记者都会刻钢版，都会印刷，一张蜡纸最多可印刷2000份。当前方传来重大捷报，我们用红色套印，十分醒目。群众把我们编印的套红报纸叫“红报”。边缘区的民兵夜间把报纸贴到据点的土坯子上，吓得日伪军不敢出碉堡。一次，日伪军下乡抢粮，民兵把我们编印的“红报”，贴在村头路边，叫伪保长告诉伪军说：“新四军队伍刚来过，红报还贴着哩”，敌人听了掉头就逃。

随着反“扫荡”，反“清剿”斗争的节节胜利，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记者的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大。当时我是滨海报社二分区特派记者，在中心区，在游击区，在地方武装的连队，在乡村田头，都留下自己的足迹。新闻记者的工作条件是艰苦的，穿的是一身旧军装，或粗布便服，背着背包，脚登草鞋，腰间挂着挎包，里面放有稿纸、铅笔和我爱读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这本书已传阅过好多人，书的封面已打上好几次“补丁”。从黄海边到运河堤畔，有时要走上几十里路，才来到采访的地点。白天向乡村干部、贫下中农和民兵了解情况，参加他们的活动，晚上，在豆油灯下，和工农通讯员

一起商量写稿。工农通讯员大多是刚脱盲的青年农民，是抗战中办起的冬学，才使他们识字的。他们读报，写稿的热情很高，为了报道他们自己的斗争事迹，用孩子在私塾用过的描仿纸，在背面作稿纸用，对不识的和写不出的字，就画圈圈空在那里，我在旁边帮他们一个个填上，一个个改正错别字。我和工农通讯员像亲兄弟一样，他们叫我“指导员”（过去我曾当过武工队指导员），也有的叫我“小记者”（那时我17岁，看上去很小）。我们每在一地采访，都建立通讯组，发展工农通讯员，在每一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撒下党报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种子。

我没有学过新闻，写什么，怎样写，都是抗日斗争的实践和广大农民、指战员教给我的。在抗战期间，我们从办油印报，到石印报，到铅印报，我先后担任《滨海报》、《苏中报》、《群众报》、《人民报》特派记者，我在报纸上写新闻，写通讯，写民谣民谚，写小调，写连载故事，群众需要什么，抗日斗争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有一年，天大旱，我和农民一起赤着脚在河边戽水，农民们脚踏着水车，不停地唱小调，我边劳动边在休息时间向他们采访，记录不少农谚和小调，我写过一首“车水锣鼓五句半”的抗日小调，传唱的很多。有一次，我和五个乡的上千个民兵，到敌占据点进行政治喊话，那是一天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到据点前，大家分散开来，点燃无数火把，喊声震天，民兵宣传员指名道姓地向据点里的伪军喊话，要他们及早投诚，改过自新。敌伪军被这一惊人的举动吓住了，以为新四军大部队要攻据点了，打了一夜的乱枪乱炮，第二天即有五六十个伪军开了小差。我采访了其中几个投诚的伪军，写了《三个和平军的故事》在报纸上连载，有些区县又把这篇连载故事当作向伪军发动政治攻势的材料。还有一次，我随分区武装参加对敌伏击战，日伪军乘武装快艇向我中心区袭击，在河对岸有日伪军掩护，用重

机枪、机关炮疯狂地向我军扫射，我和战士们在战壕里，沉着地阻击敌人，我一会儿为他们传达指挥员口令，一会儿又为他们运送手榴弹，分不出谁是记者和指战员。直到战斗结束，趁着打扫战场的空隙，我掏出笔记本，采访几位作战英勇的指战员，把他们的英雄事迹发表在报纸上。我经常想到，我是党报的新闻记者，党和人民给我这支笔，是为抗战、为人民服务的，我们记者和指战员都是这所抗日大学校的学生。

在抗战中做记者，接触过许许多多的人，有许多美好难忘的回忆。我采访过苏中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将军，他向我介绍和分析了苏中反“扫荡”斗争的形势；我采访过威震四方的民兵队长万国林，他只身化装进据点夺机枪的故事广为流传；我也采访过开明士绅叶青，写过他支持抗战、热心教育的事迹……。对抗战英雄人物我是深深敬佩的，对为抗战奉献而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我也难以忘怀。当时为了从这个县到那个县采访，或者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和据点，我们记者和各县交通站（地点是隐蔽的）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我们人到那里，各县交通站就把工农通讯员给我的信稿转给我，报社给我的信也由他们寄送，尽管记者只有一人，又四处采访，但仍同各地区、各部队通讯员保持一定联系，不断了解到抗日斗争的一些信息。使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是台北县交通站的一位交通员，名字已记不起了，只记得他的浑名叫“小老鼠”，他无数次地冲过敌人封锁线，把我们的报纸送到下一个交通站。他个子小，带着一顶破毡帽，拎着一个大竹篮，肩上扛一把长木柄小铡刀，装着去挖猪草的样子，猪草下而藏着我们刚印刷好的一卷卷报纸。我好多次采访，都是他带我冲过封锁线的，而且他在交通站听到四面八方的信息，有的新闻报道线索也是他和我一同行军中聊起来的。后来敌人在一次“扫荡”中发现了他，敌人严刑拷打，他

宁死不屈。像他这样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虽没有被授予抗战英雄称号，但他们为抗战献身的光荣业绩，使我们幸存者一想起他们就肃然起敬。毛泽东说过：“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这是一条平凡而伟大的真理。抗日战争的每一个胜利，正是不断觉悟、不断奋起的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用鲜血、用双手，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争得来、夺得来的。

1945年8月，我正在宝应县天平庄参加新华社苏中分社记者大会。我代表新华社苏中二支社在会上作了如何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的发言。8日晚，从电波中传出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到会同志庆祝这个大喜大庆的日子，团团围在一起，不停地欢呼、歌唱，不停地歌唱、欢呼，“抗战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每个人热泪满眶，激动不已，每个人都在想新中国的前景，想祖国和平建设的明天。有的同志想着要回到上海大城市工作，有的想早日见到久别的父母，有的想明天要重新学习已中断多年的学业……。大家兴奋了一夜，也想了一夜。第二天传达上级指示，要各支社同志立即返回原地，组织前线记者采访团，报道向日伪军受降情况。我回来后，即带领前线记者采访团和一部电台，跟随主力部队行动。由于日伪军拒不投降，我军发起凌厉攻势，下宝应城，克兴化城，攻高邮城……，部队连续作战半年多，一直打到长江边。抗战胜利的果实，仍是靠浴血奋战，一城一池地夺过来的。抗战胜利了，但胜利确是得来不易啊。

历史翻过一页又一页，抗战胜利已过去五十个年头。今天的青年人只能从历史书上才知道抗战的史实，但我想告诉青年朋友，在那峥嵘岁月里，无数青年为了反抗侵略，为了爱国救亡，愿把青春换明天，表现了勇往直前的大无畏气概，这种民族精神决不会因时间流去而消逝，它将刻印在每个中国人，每个中国青年的心里！

一个美国记者看抗日战争

马 飞 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开始，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结束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中国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奋勇作战，坚持抗战到底，不晓得世界大战会经历什么曲折的过程，才能取得胜利。抗日战争对于世界人民取得战争的胜利，起着独特的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五十周年了，时光虽然容易流逝，但抗日战争的历史功绩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在抗日战争开始的前几年，特别是 1938 年末广州和汉口的失陷，惊动了国民党一些当权者，他们对这场战争能否打下去失去信心，十分悲观。同时也惊动了西方许多国家，他们也怀疑中国抗战能否抗下去，对于支持中国抗战，抱着犹豫不决的暧昧态度，宋美龄曾经愤慨地说过，如果中国战败了，那不是因为中国缺乏勇气，而是因为中国被英国的绥靖、美国的图利和法国的懦怯所制成的圈套绞死的。她的观点正是反映了当时国民党一部分主要当权者不想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寄托在美英法的干涉上，以致失去信心的心态。

正在这时候，美国名记者、国际形势的分析家、评论家 O·拉铁摩写了一篇《美国不应坐失时机》的文章，刊在 1941 年 4 月份《亚洲》期刊上。文章对当时世界大战、抗日战争和战后形势，进行认真的分析，提出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一篇比较有卓识有远见

的重要文章，有助于澄清当时人们的某些混乱思想，提高对坚持抗战的认识。我在上海地下文委系统工作时，曾把全文译登在1941年8月30日出版的《上海周报》上。

这篇文章开头对国际形势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对中日两国采取犹豫的缺乏明确目标的政策已经四年了。即使我们的远东政策在求避免战争，但是战争却愈加接近我们，而且还养大了一个要攻击我们的敌人”。在这篇文章发表的两个月后，便发生了德国突然攻击苏联的战争；半年多后，日本竟然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发动太平洋战争，把战火烧到大半个地球。面对法西斯的疯狂侵略，世界人民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联合起来迎头痛击。西方主要国家对于侵略者的恐惧、妥协甚至想从战争中发财的企图，自然是会自食其果的。这是严重的历史教训。

这篇文章还分析了抗日战争对西方国家的得失。文章说：“现在日本的全力已经被束缚在一边，因此在这一边加强中国，藉以更多牵制日本，显然比在其他方面的种种努力都容易。”“假使我们现在加强援华，这无异就是挽救了我们自己，中国胜利不单是只挽救了她自己，而且也挽救了我们”。文章接着说，“有一批人他们很害怕，一个中国决定的胜利——不能否认，这个胜利一定会改变亚洲的中心——也许会鼓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而至骚动得无法处置”，认为“一点也不错，如果亚洲趋向解放，美国将没有安闲的日子”。因此，文章向美国当政者献策，“今日唯一的问题，就是这种激变是否来得有次序，要一起阻止它们是不可能的。”客观形势，陷西方国家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既怕战争，又怕战争引起革命。这也许就是他们采取犹豫不决政策的根本原因。

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西方政策的利弊有着较深刻的分析。文章说：“如果我们使中国起了混乱，那是